

doi:10.3969/j.issn.1674-117X.2019.02.004

湖南作家作品研究·秦羽墨专辑 主持人: 广州大学龙其林教授

主持人语: 湖南青年新锐作家秦羽墨以散文创作引起广泛关注, 他的作品刊发于《天涯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散文》《黄河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文学界》等刊物, 先后入选《中国年度最佳散文 2011》《中国年度最佳散文 2013》《散文中国》《海外文摘》等多个选本, 多次被《散文选刊》转载, 散文集《通鸟语的人》入选 2016 年度“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。秦羽墨以湖南永州的乡村为精神根据地, 创造了蒿村这一颇具特色的文学地理世界。与被精英阶层诗意化、抒情化、伦理化了乡村世界相比, 秦羽墨笔下的蒿村充满了抗争与屈服、贫穷与自得、不幸与期待; 与同龄作家喜欢扎堆城市、书写风花雪月不同, 秦羽墨的创作始终关注着乡村生活的喜怒哀乐, 通过散文传达着乡村生活中那些令人怦然心动或者惊心动魄的细节。本期推出的秦羽墨研究专辑, 从不同角度探讨秦羽墨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, 力求对其散文创作进行多维度的解读。秦羽墨还很年轻, 他的写作才能刚刚展露, 我们有理由对其未来的创作抱有更多的期待。

虚伪而真诚的道路

秦羽墨

(常德市文联, 湖南 常德 415000)

中图分类号: I207.2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4-117X(2019)02-0021-05

引用格式: 秦羽墨. 虚伪而真诚的道路[J].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19, 24(2): 21-25.

很多人谈论写作时, 说不清, 就来一句: 因为爱啊。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爱是世间最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件事, 甚至是恨的同义词。用原本说不清的事来分辨另一件事, 当中有多少真诚, 又有多少虚伪? 当我们谈论写作的时候, 更多的其实是在谈论一个人的命运与际遇。

我一点也不喜欢写作。这并非矫情, 在我看来写作是失败者的行业。我写下夕阳, 夕阳就落了下去; 写下童年, 童年转瞬不见, 伙伴们都已两鬓发白; 努力讲述梦境时, 我的人早已经醒来, 捕捉到的只有幻影。所以, 我很少提及爱情。我

写过不少关于亲情、苦难、饥饿以及山林草木的文章, 这些我无一例外都失去了, 而它们是那么的令人怀念, 包括那些苦难与饥饿——没有它们, 我就不能成其为我。

可我还是写了好几年, 并且打算再写一阵。读书写字对现在的我而言, 已经像呼吸一样自然; 一个人不呼吸, 马上会死掉。写作是一场宿命, 很难说是你找到了路, 还是那条路凑巧出现在你脚下。将来若有什么高科技能让人一辈子都不做一个梦, 文学或许就会消亡——我想, 那是不可能的。我的所有文字都是关于梦的, 这是一段无

收稿日期: 2018-06-28

作者简介: 秦羽墨(1985—), 男, 湖南永州人, 常德市文联作家, 研究方向为散文和小说创作。

从选择、无从躲避的旅程。你控制不了自己是否做梦,梦里又会说些什么,从哪里开始,又到哪里结束,梦里的事你决定不了。真要找一什么理由,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爱胡思乱想。中国的现实,最不允许人胡思乱想。常常的,我只能对着自己说梦话。梦话说得太多,就忍不住要写。

我从小就没有写作天赋,众多堂兄弟中,我的语文成绩最差,考试及格的次数屈指可数,上语文课时我尤其害怕写作文。据母亲和村里长辈的回忆,我3岁还不太会说话,5岁还要吃奶,也就是说,我是个弱智——至少表面看是这样。依稀记得,6岁那年村里小学的老师来家里动员我去上学。想到每天忍饥挨饿,走那么远的山路去学校,然后整天坐在教室里像个傻瓜,哪有在家放牛抓鸟,海阔天宽般舒服,我就死命不去,就算挨鞭子也不去。那时正大力推行九年义务教育,老师们有任务,谁谁谁管哪几个大队,没落实的扣工资。姓唐的老师前后三次来我家动员,前两次都被我巧妙地躲过了。最后一次,父亲将我摁在板凳上,打算用牛绳绑住,吊起来。唐老师吓唬我说,九年义务教育,国家规定的,人人都要学,儿子不读书,爹妈就坐牢。我信了。第一天上学,出门时我回头跟父亲说:“老子啊,我的书可是给你读的啊!”我妈在旁边一听,眼泪出来了,不知道是在哭,还是在笑。哥哥之后,她又生了两个,都夭折了,轮到我,好不容易养大,居然是个傻子。

至于成绩,可想而知。我虽到了学校,但跟在家放牛没区别,成天捣蛋惹事,小学五年级以前,每次考试我都稳定在倒数五名之内。现在,偶尔有人称道我的文字,我就跟他们说,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村里能用箩筐挑,他们只是不屑于写罢了。他们都有自己的谋生技能,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过日子,怎么会去干写字的苦差事呢。

事实也是,山里考上大学的大多是蠢人,死脑筋、听话的笨蛋,只有他们认为唯有读书才是出路,才愿意用那么多时间去背书。其实,童年的乡村世界随便一样东西就能把聪明的脑袋吸引过去。据我观察,作家队伍里也是笨蛋居多,只有脑子迟钝者才坐得住,肯花那么多功夫去琢磨字句;聪明的人都是浅尝辄止的,一开始没捞到好处,很快转向别的行业,有那些精力干啥不行,得到的回报远比写字多。

偏僻的湘南山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理想,那里没有可供参照的人和物。我当时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放羊娃,因为这样可以逃离学校和家庭。我不想被任何人管制,像害怕瘟神一样恐惧我的师长;而放羊,羊群得听我的指挥。我也只会打理羊群,让它们按照我的意志生长。或许,所谓“打理”,就是我第一次对世界发表的看法。

我家祖上出过将军,也出过武夫,但从没出过作家,方圆百里也没听说谁以写字为生。出门打工能把家书写顺畅,过年时,能贴得好对联,便是文化派上的最大用场,没有谁会将要学到的文字用来做文章写书。我从未接受一丝来自家庭的文学教诲。小时候家中仅有的几本书是打上文革烙印的《鲁迅选集》和《隋唐演义》之类,它们作为父亲茶余饭后的消遣,绝大部分时间与农具摆在一起,破败不堪,不但缺张少页,还沾满了鸡屎和猫粪。父亲一开始就反对我学文。他说,报纸上说有个人搞写作把自己弄疯了,我脑子这么笨恐怕更容易走火入魔。他还等着我将来养老送终呢,要是疯了,这个儿子就白养了。父亲尤其强调,学文容易与政治挂钩,我们家两代人都吃了这个亏,至今翻不过身来,可别这样了。

可惜我不争气,理科太费脑子,而文科只需要死记硬背。我高中理科读了大半,实在读不下去,无奈之下,临时转到文科班,勉强上了一个大学。

来常德之前,我只见过大地的“地”,没见过大地的“大”。在湘南老家,种的田是梯田,走的路是羊肠小道,16岁之前,仅仅去过几次县城。第一次火车开进常德,从洞庭湖平原驰过,放眼望去荷花翻飞,白鹭成群惊起。那是九月,是荷花的最后一段光景,依然美到超出山里人的想象。这就是柳永所说的“三秋桂子十里荷花”了?岂止十里,简直是百里千里的气象。当时心想,若是能在这么平坦的地方,种上一块田,也算是值了。湘南的梯田实在难种,挑谷担肥,将人当牛马用,产量也极低,我出生时,村里人依然不能完全解决温饱问题。因此,大学毕业后,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去了金健米业——当地一家粮食企业,真的是种田。可后来发现,不管是山区还是平原,种田总是辛苦的,于是我果断选择辞职。

彷徨,无计,进而绝望,没有人能为我的职业和人生提出规划,更谈不上指导。我的亲人,

我的长辈，他们一辈子生活在大山里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，除了教我吃苦耐劳，任何精神层面的东西都是缺失的。那时的我如同趋光的虫子，想摆脱命运，却不知道光明在何处，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。

有一天，我无意阅读到了余华的一篇随笔。在那篇文章里，他大谈自己如何从牙医走向文学创作，最后成为了一名作家。余华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家，之前只知道他小说写得好，没想到随笔比小说更棒。据他文章里说，他之所以写作是想去县文化馆上班，因为那里的人每天都在街上晃荡，而牙医一辈子只能跟一张又一张臭嘴打交道，无聊透顶。当中有一段尤为打动我——余华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，10点才去，想试探一下同事的反应。结果，他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，仿佛他就应该这个时间来。于是他说，这地方算是来对了。按照余华的描述，文化馆的工作就是到处晃荡啊，将游手好闲当职业。如果这样，那就跟在乡下放羊差不多，无疑也适合我。余华1983年1月份发表处女作，当年年底就调去了文化馆。余华是个牙医，半路出家。我是学中文的，大学参加过文学社，也写过一些东西，不能连个半吊子牙医都不如啊。于是，我埋头写了起来。后来，果然如愿考进了常德市文化馆。只可惜，一进文化馆，我就发现自己上了余华的当。

文化馆已经不是余华说的那样了，如今，它跟其他政府机关没有任何区别，一律按部就班，不可能让你自由写作。进文化馆的第一天，我就想着离开，想着恢复自由之身。可离开是需要资本的，我不得不继续写下去，积累这个资本。一段时间后，事情有了转机，好像真的可以离开了，可我一点也没觉得轻松，因为一进一出之间，身边多了一件东西——文学，我发现自己已经跟它永远在一起了。

我一直都很清楚，自己爱上的不是文学，而是自由，一个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。对别人来说，可能有其他方式；对我，除了认识几个字，再无别的可能。文学是一条贼船，我上来了，这是一个偶然事件。一个人一辈子遇到的路可能有千万条，聪明一点的甚至都可能走通，可最适合他的，有且只有一条，那宿命般的一条。对我而言，那

条路就是文学。纵观世界文学史，很少有人生下来就将文学作为理想的，是命运将大家推到了这条路上。想到这儿，我内心略微有点坦然，否则，别人都是真心热爱，唯有我是被迫，跟做贼似的，心虚得很。

确实没有理想可言，那是一条虚伪的道路，是对现实不满的幌子。写作的最大乐趣就是，你可以在里面自欺并且欺人，公然行骗。说白了，写作是一种骗子艺术，不过，你首先得拿出最大的真诚，换取别人的信任。如此，才能让你的描述显得可信，这虚伪里夹藏着世上最大的真诚。让文字里的世界比眼前的现实来得可靠，这要求高明，而我真诚有余手段不足，成功的机率太少，却屡屡被他人捕获，成为别人的文字信徒。

尽管如此，我很难说服自己不去写。毋庸讳言，写作对于我是一次又一次的刮骨疗伤。每次干完工作，我的灵魂如同遭受万箭齐发的伤害，像死过一回一样，那些箭簇上带着致命的毒，非得写一个什么东西才能将毒素逼出体外，恢复元气。因为从小体弱，我的康复期显得格外漫长，有时是一个月，有时则是好几个月。这段时间也基本左右了我的情绪波动。我不愿意与人交流，闭关是常态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张口，那些堆积在体内的毒箭就会射出来，击中对方。文字是唯一救命的灵丹妙药，只可惜配方捏在大师前辈们的手中，讨要的过程非常艰难。不过这期间也充满了乐趣，只有此时，我才觉得自己尚且活着。

鱼离开水，才懂得舞蹈；天鹅临死，才会玲珑歌唱。你们看到的美丽弧线，听见的美妙歌喉，正是一部分人面对命运的奋力挣扎。

很多作家喜欢夸大写作的意义，其实他们并不是在说写作这件事，而是在强调自己的重要。作家不应过多谈论自己，高明的作者会努力把自己隐藏在文字的缝隙中。事实上，绝大部分作品只对少数人有意义，也只有少数人喜欢。如果有几个人去认真读一部作品，并且感到了它的意义，那它就成功了。

前几年我一直在写散文，不是我格外偏爱这种体裁，而是在生活层面我有话讲，不吐不快，而散文是离生活最近、烟火味最浓的文体，写来直截了当，不用绕弯子。在小说和诗歌不断经历变革、江湖流派层出不穷的情况下，散文长时间遭

受冷漠,显得十分凄凉。不过,散文写作近年出现了难得的热闹,在场、原生态、新乡土、非虚构等各种形态,旗帜变幻,山头林立。但在我看来,这些都是外在的。写什么从来不应该成为讨论的话题,一个人只会写他最熟悉、最有言说欲的东西,舍此无其他。写作的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。庖丁解牛,千变万化,招数一一使出来,可最终散文还是一种自言自语的文体。某种意义上来说,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美学发明。这是我对散文的终极认知。

在散文的书写上,一个作家不一定懂得怎样与人交流,精通和人说话,但一定懂得跟花草说话,跟石头说话,那些话都是说给自己听的。在这条道路上,绝大部分人被语言驱使,像河流带走的枯枝败叶;小部分人简单运用语言,像被流水冲刷的石头,磨出一点样子,做生活工具;极少一部分人懂得发现语言,表达对天地人世的看法,记录浮光掠影的历史;只有少数几个天才能创造语言,赋予它们新的生命,让它们自由呼吸,活得比作者自己还要久、还要精彩。世界上没有一个词语是平庸的,其平庸只是因为未落在合适的位置上。有一种说法,好的文学一般产生于害羞的人,如孤独的性格,忧郁敏感的情绪,对词语相当敏感,等等。

对那些将文字写得过于优美的文章,我总怀疑其用心与质地。帕乌斯托夫斯基在《金蔷薇》中说:“有些词语比事物本身更美好。”他承认了词语的伟大之处,但他说的是更美好,而不是更真实,也不是更有力量。阅读上,我宁愿信任那些粗粝的、野性的篇章。有时候,美和假是同义词。

写给看的人越少,自我气息就越浓,抵达得就越远,就越不可替代。一个人把写作姿态低到尘埃里,他的境界自然就高了。当他开始端起架子讲道理,一切就会在瞬间失去意义。往往都是这样,最好、最真实、最柔软贴切的文字,都是写给极少数人的;更有甚者,是写给未来的读者的。这些年,我看过太多只见才华而不见生命的作品,这些都属于无效写作。他们写东西并不是真东西可写,而是别有所图。这些人写了一辈子,表面看起来“著作煌煌”“虚名缠身”,其实一个有价值的字都没留下。什么是有生命的文字?就

是要有体温。不仅有胸腔的温度,还要有生命自我无法觉察的节奏。那些文字是像草木一样从心底自然生长出来的,有独立的生命,而不是依靠学识捏做出来的。不然,就真是在“作”文章了。写的人累,读的人更累,给审美蒙了一层厚厚的老茧,读之有害无益。女娲呵气造人,一团泥巴立马活起来,好的作家也要具备这种能力。他不仅是文字的运用者,更应该是语言的创造者,要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才华。我说这话的时候心虚而恐慌,做到这样,何其难也!

散文是个人的心灵史,但又不完全是属于自己,它必须能代表一部分读者和人类的共同痛感。从这个程度上说,散文也是大众的;心脏是自己的,但心脏的跳动声是整个人类的。

如何处理散文题材,我比较赞同一个说法,就是要做减法。散文的写作到最后不止是词语上的减法,也是人生切口的减法。一个作者写自己热爱的事物,从一开始是写全人类,到最后回到写自己的村庄、自己生活的那个小镇、自己的亲人。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有做减法的过程。写到最后,有很多东西我们渐渐不会了,我们只会做很小的事情,写很少的东西——写给自己或者写给最少的人看。

所以,仅仅写得好是不够的,你还要写出别样的价值,因为你不是在为他人歌唱,而是表达自己。表达是艺术的终极意义,一个字太像字,一个作家太像作家,一幅书法太像书法,都不是艺术。他是在模仿别人,或者给别人提供学习模板,它什么都可能是,就不可能是艺术。

我的理解,好的散文和好的小说一样,都应当是一个寓言,细节上、情绪上能包罗万象,让人看到更远的地方。散文也需要一个核、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、一股沛然之气,这和小说几乎是一样的。

当下的散文评论,一会儿批评乡土散文过于泛滥,一会儿又指责非虚构功利心太强,“好像全中国的作家都住在一个村子——小山村或者城中村”。我觉得这毫无道理,一个人写什么,是无法选择的,它不是政治站队,观察衡量一番之后再趋利避害。对那些不熟悉的风光,就算描写了也只是浮光掠影,在表皮上挠一把痒,还不如干脆别伸手。

我以为,写作这个领域,从来没有陈旧的内

容，只有陈旧的形式。当沈从文把乡村写到了那种程度时，便有人出来说，乡土已经被他写完了，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可写的了。可是后来，张承志、韩少功出现了；再后来，刘亮程、谢宗玉也出现了。作为文字艺术，它的对象永远只是社会、大地、信仰，但形式是变动的。乡村不会被写完，城市也不会被写完，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瓜葛更不会被写完。担心这个的人，完全是在杞人忧天。

过去几年，我的散文写作一直以乡村题材为主，这是由我的出生所决定的。有人问：你怎么不写点别的？这就好比要一个人重新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，荒诞而滑稽。我生在乡土，最初的写作自然只能从那里开始。对一个写作者来说，我们可以离开故乡，但不能让故乡离开我们。故乡不是某个明确的地方，也不是明确的人和事，而是一种精神皈依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城市化水平这么高了，乡土文学依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位置的原因。不单现在，恐怕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仍然是农业国家，至少在文学上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的根在泥土里。我相信，一个人一生中只要有一次触摸到泥土，看见群鸟从村庄上空飞过，那么他的内心到死也会装着那片土地。

不管别人怎么写乡土，都与我无关，我只写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。过去十几年的散文写作，乡土确实已被严重伤害。先是过度批评，然后又无尽止地歌颂，仿佛那里是人间净土，是人类最好的归宿。事实上，乡土散文热闹也好，寂寞也好，和乡土本身没有什么关系，那块土地并没因为别人的书写停止衰落，或改变它的更新趋势。恰恰相反，写乡土的人无一不在逃离现场，和其写下的一切越来越疏远，那些人跟我一样，大多生活在城里。

现在，我已经开始把镜头切换到城市，我已经在城市生活十几年了，写作的选择就像观景，只有拉开一定距离才能看清事实，才能准确下笔，目前这个时间点我正好可以去写写它了。

读书就像旅行，不出门，就不会遇到那个召唤你的人。写作也是一样，这是一条虚伪而真诚的道路，很多时候，你记下什么风景，笔下会跳出一句什么话连你自己都无法预料。但只有写，才有别的可能，才会遇见一个更完整的自己。

责任编辑：黄声波